

# 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评价与分析

## ——基于江苏 13 个城市的问卷调查<sup>1</sup>

叶继红

**【内容提要】**：基于生活满意度的“维度—区域—结构”分析视角，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评价尚可，生活质量既存在区域性差异，又存在结构性差异。生活质量的区域差异，可以看作是农民集中居住不同发展阶段的表征，大致代表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结构性差异显示出生活质量内部各要素发展的不平衡，也凸显了生活质量指标中健康、居住环境、自身教育等的重要性。同时发现，当前江苏尤其是苏南、苏中地区失地农民的生活逐渐从温饱走向小康，传统上视失地农民为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看法需要改变，给失地农民去标签化。因此，可以将生活质量看作是江苏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政策的效果的“指示器”，并根据不同地区生活质量的实际，采用不同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生活质量 生活满意度 集中居住区 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C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82（2019）01-0105-09

当前，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征地拆迁、撤村并居或村庄整治而进入集中居住区居住和生活。江苏是较早开展农民集中居住的省份之一，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生活究竟如何？有必要通过对他们生活质量的系统考察来解答，也需要通过生活质量研究来检视目前集中居住政策的实施效果。

### 一、引言

生活质量最早源于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目的的反思。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言，“重要的不是物品的数量，而是生活质量”（Galbraith, 1967），从而将经济增长与生活质量连在一起。之后，经罗斯托（Rostow）、坎贝尔（Campbell）等人的发展，生活质量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建构量化的测量指标体系。国外先后开发了用以反映生活质量的“生活满意度”、“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等指标，并最终形成了主观指标、客观指标，以及两种指标相结合进行测量生活质量的方法。生活质量因而也被定义为“由包括客观指标和对生理的、心理的、物质的、社会的、情感的幸福的主观评估所构成的总体的一般幸福”（Felce&Perry, 1995）。国内生活质量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1985 年，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在天津开展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调查，将生活质量的主观指标（生活满意度）测量方法引入国内。随后一些学者尝试将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结合起来，集中探讨了生活质量的主、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2000 年以后，幸福感研究开始为国内学者所关注，于是呈现出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幸福感三个方面研究并存的局面（风笑天，2007）。

近些年来，随着撤村建居和农民集中居住的快速推进，失去土地的农民被集中安置进政府部门新建的居住小区（也称为农民集中居住区）。失地农民（本文称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开始引起学界关注。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研究视角。

<sup>1</sup>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转居社区转型与社区治理研究”（编号：15BSH07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区域比较研究”（编号：16JJD840006）；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项目“新常态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对策研究”（编号：MZ33710417）。

**作者简介**：叶继红，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苏南政府治理现代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苏州 215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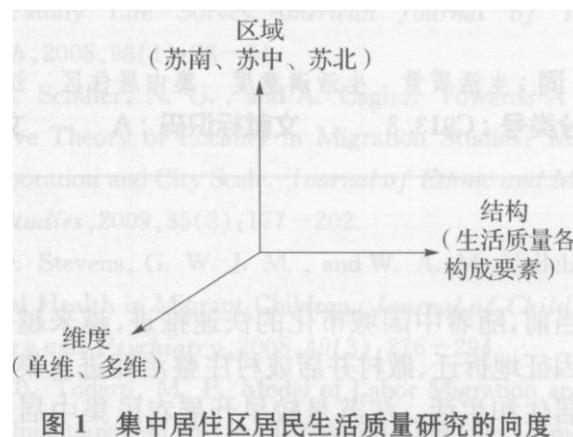
第一，从福利变化情况反映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与福利有一定的关联，一些学者从福利变化的角度进行了调查和研究。贾燕等（2009）基于江苏江都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认为，集中居住使得农户总体福利水平稍有提高，其中，农民的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发展空间、心理指标都有不同程度改善，但是社会保障、社区生活和环境进一步恶化。马贤磊、孙晓中（2012）通过对南京和淮安两地失地农民调研后发现，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但并没有显著改善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伽红凯、王树进（2014）通过对苏州、扬州、宿迁三地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后认为，农户福利水平在土地征收后有所提高，但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之间，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福利变化的差异较大。而蒋和胜等（2016）通过对成都市不同圈层的研究后发现，征地和集中居住改善了农户的居住条件、社会保障、社区活动和社会资源等功能。这些研究都同意农民失地后总体福利有所改善，但在得到改善的具体内容上有所分歧，甚至结论相反。

第二，从生活满意度方面反映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是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吴云青、张文静等（2015）通过对天津市失地农民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得分为 3.8 分，总体尚可。陈占锋（2013）通过对洛阳、贵阳、天津三地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总体生活满意度不高，均值为 2.9 分。赵丹、黄莉曼（2014）通过对四川省荣县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失地农民的生活满意度偏低。被调查者对失地后的生活表示满意的只有 19.8%，而回答不满意的比例高达 81.2%。夏永久、朱喜刚（2013）通过对南京郊区拆迁安置社区的案例研究，发现社区满意度评价整体偏低，其中以就业环境、设施配套及地理空间维度尤为突出。不难看出，这些针对不同地区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结果差异较大，总体上以满意度偏低居多。

第三，通过构建生活质量指数来反映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吴丽、吴次芳（2009）以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12 个社区为例，建构了失地农民的生活质量指数。研究发现，开发区内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总指数的均值为 0.5678，生活质量总体位于较高水平，且呈现出时间性、区域性的特点。尹雨晴（2014）对陕西杨凌示范区失地农民的幸福指数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该市失地农民幸福指数为 65.12，表明幸福水平整体不太高，处于一般水平。虽然计量的示准不同，但可以看出不同区域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水平确实存在差异。

以上从不同角度对失地农民生活质量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和了解该群体的实际生活状况，也为本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不同的研究者设定了不同的指标体系，一些研究的指标设计过于简单，相互间很难进行对比研究；第二，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或指数既存在结构性差异，也存在区域性差异，但很少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第三，对于生活满意度的研究，只给出了单维度生活质量得分，没有计算多维度生活质量得分，也没有阐明单维度与多维度之间的关系。

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生活满意度（即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作为分析工具，首先建构一个相对完善的指标体系，将“那些人们认为比较重要并可以据此判断其整个生活质量的所有事物”（InoguchiFujii, 2009）纳入进来，完善已有的指标体系。其次，从单维度和多维度两方面呈现失地农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并分析其区域性差异和结构性差异，形成生活质量研究的“维度—区域—结构”三个向度（图 1）。第三，运用结构模型的方法，分析影响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因素。



## 二、指标建构、方法、数据来源

### 1. 指标体系建构

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是如何构建一套涵盖生活质量各领域的、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个体的生活质量水平可以由个体对各个生活领域的满意度来反映，如健康、工作、休闲、教育、家庭、友谊、生活水平、邻里关系、居住环境等（周长城，2009）。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围绕生活质量的7个方面（经济生活、居住出行、社会关系、休闲娱乐、社会保障、环境与健康），设计由18项指标组成的主观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表1）。

表1 集中居住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指标体系

名称	领域	测量指标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	经济生活	工作状况
		收入状况
		消费状况
	居住出行	居住状况
		交通出行
		配套服务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	社会交往	邻里关系
		社会交往
	闲暇生活	闲暇生活
	家庭生活	婚姻生活
		家庭生活
		子女教育
		自身教育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
	环境与健康	小区环境
		物业管理
		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

### 2. 主观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的测量

主观生活质量测量有单维和多维之分。单维生活满意度是指个体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总体感受与评价。单维生活满意度的测量均采用单项问卷形式，其计量方法为，对于“总体上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的回答，分别有“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采用Likert（李克特）量表，分别赋值为“5、4、3、2、1”。得分越高，表明其生活满意度水平越高，反之则生活满意度水平越低。

多维生活满意度是累加的结果，它反映的是“人们对各个不同领域（比如收入、住房、业余活动、家庭生活等）的满意度根据每个领域的相对重要性加权后的总和”（英格尔哈特，2016）。其计算方法是，先按照单维度生活满意度的计算方法，计算

各城市在 18 项指标上的满意度得分，然后根据各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各城市多维度生活满意度得分。指标权重的设计采用的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法。主观赋值法采用德尔菲法 (Delphi method, 又称为专家咨询法)，邀请 20 多位相关专家对评价指标进行两两比较得出相对重要性判断矩阵，然后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得到各评判指标的相对权重。客观赋值法采用主成分方法，这种方法主要运用 SPSS 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来确立指标权重。根据因子分析法的基本原理，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将主因子表示为其所包含的各个变量的线性组合 (田水承、薛明月, 2013)。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以建立起各个主因子与其所包含的各变量的线性回归方程，而回归方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即因子得分系数，反映了自变量的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将这些回归系数进行归一化处理，就可以得到各自变量在其主因子上的权重值。

### 3. 结构模型方法

结构方程模型是一种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的方法。通过建立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结构方程可以分析生活满意度的内部结构关系。本研究将生活质量的诸要素看作是影响其生活质量的要素，分析这些要素对于总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在建立结构方程之前需要通过因子分析抽取代表生活满意度的主因子，然后分析各主因子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

### 4.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生活满意度的问卷调查。在查阅文献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设计了用以反映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调查问卷，其中包含 18 个主观满意度指标，每项指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进行测量，分数越高表示满意程度越高。课题组 2016 年 4-6 月份对江苏 13 个城市进行问卷调查，其中苏南 5 市 (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苏中 3 市 (南通、扬州、泰州)，苏北 5 市 (淮安、宿迁、盐城、连云港、徐州)。课题组采用入户调查法，每个城市随机选取 2 个拆迁安置社区，发放 100 份，13 个城市共回收 1099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 84.5%。从样本的地区分布来看，各个城市的样本分布比较均衡，大致保持在 6.1%—8.6% 之间。其中，苏南地区占 41.2%，苏中地区占 23.4%，苏北地区占 35.4% (表 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所示 (表 3)。

表 2 样本的地区分布

		频率	百分比
苏南地区	苏州	95	8.6
	无锡	93	8.5
	常州	82	7.5
	南京	94	8.6
	镇江	88	8.0
苏中地区	南通	74	6.7
	扬州	89	8.1
	泰州	94	8.6
苏北地区	徐州	88	8.0
	连云港	79	7.2
	淮安	70	6.4
	盐城	86	7.8
	宿迁	67	6.1
合计		1099	100.0

表 3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性	529	48.1
	女性	570	51.9
年龄	25 以下	54	4.9
	26-35	297	27.0
	36-45	284	25.8
	46-55	279	25.4
	56-65	120	10.9
	65 以上	65	5.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153	13.9
	初中	323	29.4
	高中	280	25.5
	大专	206	18.7
	本科及以上	137	12.5
婚姻状况	未婚	99	9.0
	已婚	965	87.8
	其他	35	3.2
入住年限	1 年以内	131	11.8
	1-2 年	189	17.2
	2-5 年	369	33.6
	5-10 年	300	27.3
	10 年以上	111	10.1

### 三、结果分析

#### 1.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基本状况

统计显示（图 2），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在两个维度上的均值分别为 3.589（单维）和 3.564（多维）。可见，无论在哪个维度上，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均值都在 3.5 分以上，生活满意度水平总体尚可。同时，单维度生活满意度大于多维度生活满意度之和，但两个维度计算出的生活满意度总体上偏差较小，除了连云港（-0.208）、南京（0.146）、泰州（0.137）、盐城（-0.128）四地偏差较大外，其他地区都在 0.1 以下。两种方法计算出的满意度得分非常接近，偏差仅为 0.025。这说明，总体上单维度生活满意度可以大体上反映总体生活质量。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地区差异，本研究对各地区满意和不满意的维度总量进行了计算。计算方法为，将每个被调查者回答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计为满意维度，回答为“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计为不满意维度，然后分别进行加总（Inoguchi, 2013）。结果显示，无锡（11.5）、南通（11.3）、扬州（10.7）、苏州（9.8）4 市的满意度总量排在前三位，而宿迁（2.7）、徐州（2.3）、淮安（2.2）、连云港（2.0）4 市的不满意总量排在前三位（表 4）。显然，不满意总量得分

较高的 4 个城市都位于苏北地区，而满意度得分较高的 4 个城市都位于苏南、苏中地区，显示出显著的区域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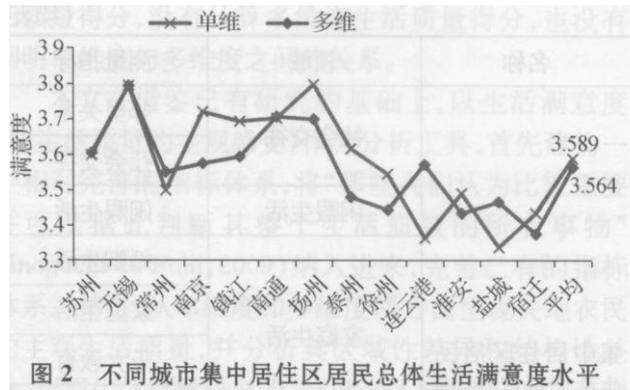


表 4 生活满意度维度表现与维度数值

		维度表现		维度数值	
		最满意	最不满意	满意	不满意
苏南地区	苏州	婚姻生活	自我教育	9.8	0.9
	无锡	配套服务	自我教育	11.5	0.7
	常州	婚姻生活	社会保障	8.7	1.1
	镇江	婚姻生活	自我教育	9.2	1.0
	南京	家庭关系	自我教育	9.7	1.8
苏中地区	南通	婚姻生活	自我教育	11.3	0.6
	扬州	婚姻生活	自我教育	10.7	0.5
	泰州	婚姻生活	自我教育	8.2	1.2
苏北地区	徐州	婚姻生活	收入状况	8.5	2.3
	连云港	婚姻生活	社会保障	9.1	2.0
	淮安	婚姻生活	小区环境	8.2	2.2
	盐城	家庭生活	小区环境	8.0	1.0
	宿迁	婚姻生活	收入状况	7.5	2.7

从满意的项目来看，婚姻和家庭生活几乎是各个城市最为满意的项目。从不满意的项目来看，苏南与苏中地区最不满意的自我教育、社会保障，而苏北地区则是收入、社会保障和小区环境，显示出一定的差异性。如果以满意维度为纵坐标，以不满意维度为横坐标，就会形成坐标图。从坐标图上不难看出（图 3），无锡、南通、扬州、苏州、南京 5 个城市为第一象限，代表满意项最大、不满意项最小的类型（A 类）；镇江、连云港、徐州、淮安、宿迁 5 市为第三象限，代表不满意项最大、满意项最小的类型（C 类）；而常州、泰州、盐城为第二象限，代表满意项与不满意项双低的类型（B 类），在水平上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

表 5 显示，A 类城市中有 3 个位于苏南地区、2 个位于苏中地区，C 类城市中有 4 个位于苏北地区、1 个位于苏南地区，B 类城市中有 3 个城市分别位于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这表明，总体趋势上集中居住区居民的满意度苏南要好于苏中地区，苏中地区又好于苏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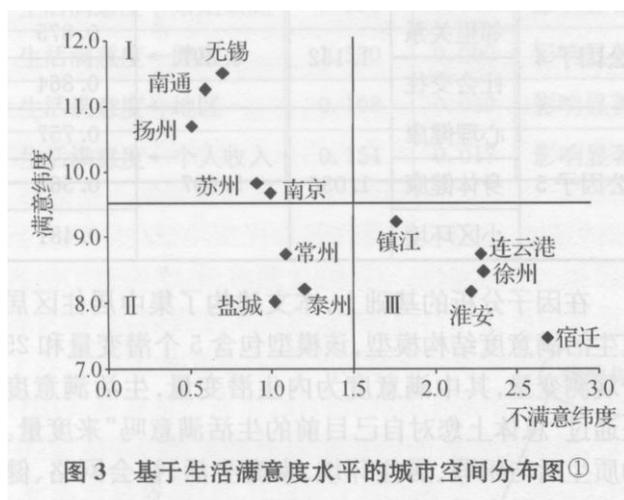


图3 基于生活满意度水平的城市空间分布图①

表5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水平比较

类型/水平	地区分布
A类	无锡、南通、扬州、苏州、南京
B类	常州、泰州、盐城
C类	镇江、连云港、徐州、淮安、宿迁

生活质量的区域性差异反映了生活质量的一个向度，与此同时，生活质量内部各要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为了更直观地分析生活满意度各维度的现状表现及改进策略，我们引入重要性指标（以各个具体满意度维度的权重来表示），以满意度得分为横坐标、以重要性得分为纵坐标，形成一个坐标图。18项满意度指标分布在四个象限内（图4），其位置分布显示了需要改进的内容和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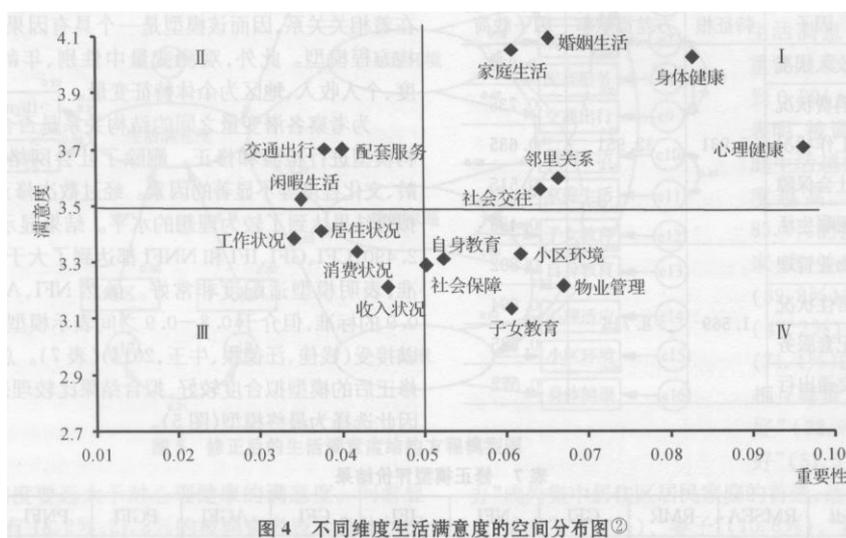


图4 不同维度生活满意度的空间分布图②

第一象限代表了满意度和重要性得分都较高的区域（高度关注区）。婚姻生活、家庭生活、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邻里关系、

<sup>2</sup>取 9.5 作为纵坐标的分界线，是由最高值（11.5）和最低值（7.5）的平均值决定的。

取 3.5 作为纵坐标的分界线，是因为 3.5 处于“比较满意”和“一般”的正中间，高于 3.5 则靠近“比较满意”，低于 3.5 则靠近“一般”。

社会交往这 6 项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说明集中居住区居民对健康和家庭较为关注，也较为满意，可以继续保持下去。

第二象限代表了满意度高但重要性低的区域（继续改进区）。交通出行、配套服务、闲暇生活这 3 项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这些指标的满意度有继续提升的空间。

第三象限代表了满意度和重要性得分都较低的区域（后续改进区）。工作状况、收入状况、消费状况、居住状况这 4 项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这说明，一方面相对于健康等非物质要素而言，收入、消费等物质性要素逐渐降低为次要方面，但另一方面，实际的收入与消费又没有达到集中居住区居民的预期水平，因此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居民就业和收入的持续增加。

第四象限代表了重要性高但满意度低的区域（急需改进区）。子女教育、自身教育、小区环境、物业管理、社会保障这 5 项指标，落在了该区域，说明这些方面对集中居住区居民来说比较重要，但相关的服务或条件又不令人满意，因而急需改进和提升。

## 2. 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在建立结构方程之前，需要通过因子分析抽取代表生活满意度的主因子。运用 SPSS20.0 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选用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保留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18 个题项调查数据的 KMO 值为 0.838,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 2950.303, P 值为 0.000, 说明适合作因子分析。最终得到 5 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贡献率 61.357%（表 6）。

表 6 测量指标因子分析结果

公因子	因子	特征根	方差贡献率	因子载荷
公因子 1	收入状况	5.931	32.951	0.835
	消费状况			0.735
	工作状况			0.635
	社会保障			0.515
	闲暇生活			0.485
公因子 2	物业管理	1.569	8.716	0.802
	居住状况			0.694
	配套服务			0.585
	交通出行			0.572
公因子 3	婚姻生活	1.329	7.385	0.830
	家庭生活			0.821
	子女教育			0.561
	自身教育			0.513
公因子 4	邻里关系	1.152	6.397	0.875
	社会交往			0.864
公因子 5	心理健康	1.036	5.907	0.757
	身体健康			0.563
	小区环境			0.481

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建构了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结构模型，该模型包含 5 个潜变量和 25 个观测变量，其中满意度为内生潜变量，生活满意度是通过“总体上您对自己目前的生活满意吗”来度量。物质生活与闲暇、居住环境、家庭生活、健康为外生潜变量，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存在着相关关系，因而该模型是一个具有因果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此外，观测变量中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个人收入、地区为个体特征变量。

为考察各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是否合理，对结构模型进行检验和修正。删除了社会网络、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不显著的因素。经过数次修正后，模型拟合结果达到了较为理想的水平。结果显示， $\chi^2/df=2.490$ ，CFI、GFI、IH 和 NNFI 都达到了大于 0.9 的标准，表明模型适配度非常好。虽然 NFI、AGFI 未达 0.9 的标准，但介于 0.8-0.9 之间表示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钱佳、汪德根、牛玉, 2014）（表 7）。总的来说，修正后的模型拟合度较好，拟合结果比较理想（表 8），因此选择为最终模型（图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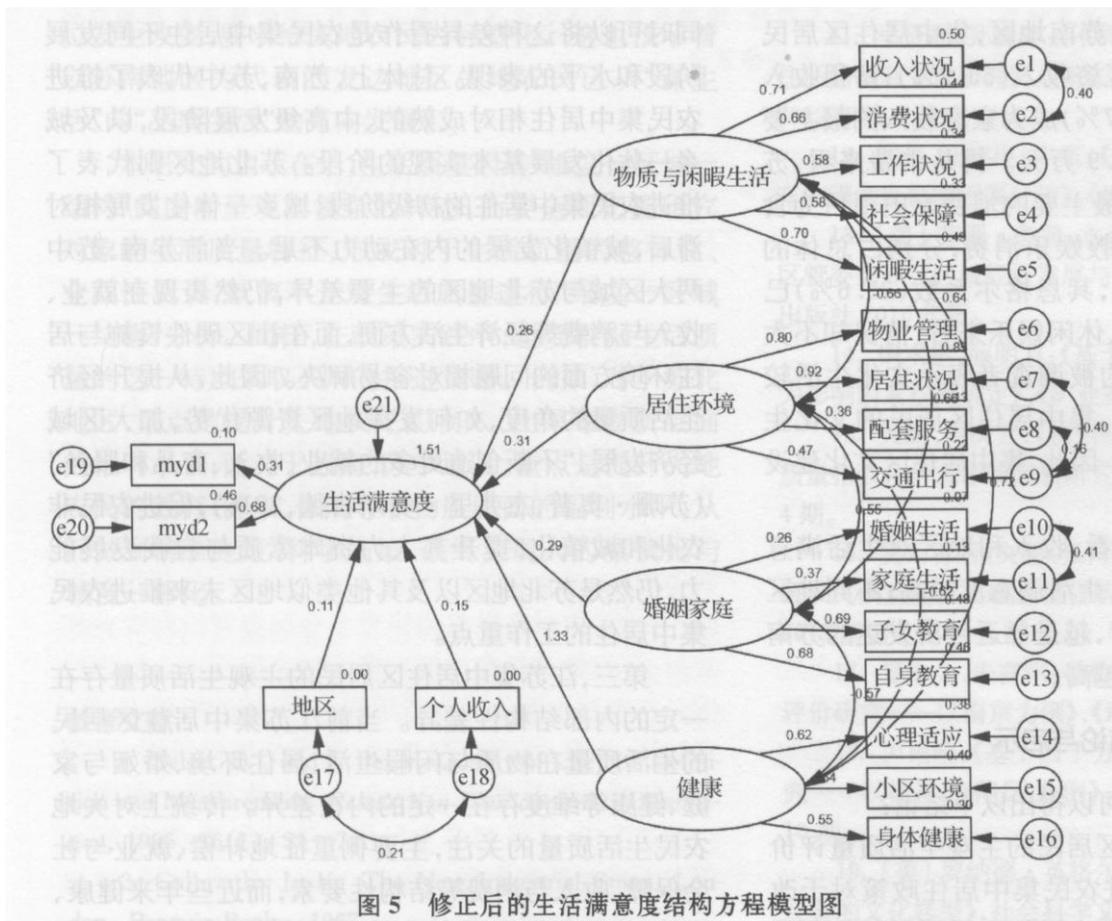


表 7 修正模型评价结果

	$\chi^2/df$	RMSEA	RMR	GFI	NFI	IFI	CFI	AGFI	PGFI	PNFI	PCFI
判断标准	<3	<0.1	<0.5	>0.9	>0.9	>0.9	>0.9	>0.9	>0.5	>0.5	>0.5
模型参数	2.490	0.064	0.060	0.915	0.861	0.912	0.910	0.872	0.606	0.630	0.666

结果显示，居住环境、婚姻家庭、健康都在 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物质与闲暇生活是在 1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同时人口统计变量值中地区、个人收入也在 5%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

表 8 模型路径系数拟合结果

路径	标准化回 归路径	P 值	检验结果
生活满意度←物质与闲 暇生活	0. 261	0. 074	接近显著
生活满意度←居住环境	0. 310	0. 014	影响显著
生活满意度←婚姻家庭	0. 288	0. 044	影响显著
生活满意度←健康	1. 330	0. 000	影响显著
生活满意度←地区	0. 108	0. 039	影响显著
生活满意度←个人收入	0. 154	0. 017	影响显著

健康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影响系数达到 1.33 ( $p < 0.001$ )。这表明，被调查者健康状况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其中，“心理健康”的路径系数最大(0.62)，其次为“身体健康”(0.55)，说明集中居住区居民对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都较为重视。这两项均值分别为 3.707, 4.023, 表明被调查者对身体健康的满意度要远大于对心理健康的满意度。问卷显示，分别有 18.2%、21.8% 的被调查者表示身体状况和心理平衡能力较差。一项研究也表明，50% 的失地农民都存在健康状况差或患有不严重的疾病的现象，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情绪焦虑或抑郁(Ying Liang, Wanyi Lu & Wei Wu, 2014)。因此，失地农民的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居住环境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影响系数达到 0.31 ( $p < 0.05$ )。这表明，被调查者居住环境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其中，居住状况的路径系数最大(0.92)，其次为物业管理(0.80)。征地拆迁后，集中居住区居民平均每户分到 1.8 套房屋，家庭住房平均为 165.8m<sup>2</sup>，人均住房面积为 42.3m<sup>2</sup>，这一数据低于 2016 年江苏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56.9m<sup>2</sup>，表明征地拆迁后他们的住房面积有所缩小，但仍然高于当年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40.3m<sup>2</sup>。从家庭主要设备来看，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设备普及率很高，几乎都在九成以上，而数字电视(70.9%)、电脑(63.0%)、私家车(54.6%)的拥有率也占了相当的比例。然而，被调查者对居住的满意度分值却不高，只有 3.413。究其原因，居住区存在小区配套服务(50.0%)、环境卫生(41.4%)、房屋质量(28.9%)、地理位置(15.8%)、户型设计(15.6%)等问题，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被调查者对物业管理的满意度分值也不太高，只有 3.217。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拆迁安置社区物业管理与服务不完善有关。

婚姻家庭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影响系数达到 0.29 ( $p < 0.05$ )。这表明，被调查者婚姻家庭生活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问卷显示，85.0% 的被调查者表示家庭关系“很好”(39.8%)和“比较好”(45.2%)；四分之三(74.4%)的家庭在夫妻相互尊重方面做得“很好”(22.9%)和“比较好”(51.5%)；“商量着办”成为集中居住区居民家庭的首选，达到 62.4%，而由“丈夫”(17.7%)、“妻子”(10.6%)、“老人”(5.1%)等决定的比例较低。被调查者对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分值也分别达到了 4.319, 4.271。所有这些都表明，集中居住区居民家庭的婚姻家庭关系较为和谐。而从子女教育和自身教育来看，二者的路径系数基本相当，说明子女教育已成为家庭生活的中心，集中居住区居民也因失地后出现就业难而认识到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这两项的均值分别为 3.137、3.313, 可见被调查者对两者的满意度都不高，尤其是对子女教育不满意。当前子女教育费用支出已成为普通居民家庭尤其是失地农民家庭一项沉重的负担，影响了失地农民家庭的生活满意度。

物质与闲暇生活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又一个因素，这表明，被调查者物质与闲暇生活越好，生活满意度越高。但影响程度相对较低，只有 0.26 ( $p < 0.1$ )。这一研究与有的研究者认为经济收入是影响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影响系数最大)有所不同(陈占锋, 2013)。在该维度中，收入(0.71)与闲暇(0.70)的路径系数基本持平，这一方面说明闲暇已上升到几乎与收入平等的位置，凸显了闲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对于健康、居住、教育等因素，收入已不再成为制约失地农民生活的最主要问题。调查显示，当前在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稳定就业率在 63.8%；工资收入(55.2%)、房租收入(23.0%)、经营收入(11.7%)成为家庭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家庭平均收入为 7.9 万元。再从消费来看，苏南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最主要的消费支出项目为食品消费、衣住用消费、文教娱乐消费，分别占总体的 35.6%、28.5%和 13.6%，其恩格尔系数(35.6%)

---

已处于“富裕”水平<sup>3</sup>。而从休闲娱乐来看,情况却不太乐观,问卷显示,57.6%的被调查者表示文化生活较为单调,尤其是苏北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文化生活单调率达到了67.4%。因此,集中居住区文化建设亟待加强。

此外,从个体特征来看,收入和地区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收入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不同地区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差异,越是靠近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评价总体尚可。说明江苏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政策对于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政策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单维生活满意度均值大于多维生活满意度均值。可能的解释是,被调查者对于自身的生活总体上感觉满意,但一旦具体到生活的某一领域,如生活成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城市交通等方面,则会感觉不太满意,因而造成了生活满意度的下降。这也说明,生活质量的各领域存在一定的关联和相互影响,虽然“一个领域的满意弥补了另一个领域的不满意”(英格尔哈特,2016),但加权后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有所下降。然而,这并不能否定单维生活满意度的代表性,它能够大致反映和代表集中居住区居民对生活的总体感受,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能会高估研究对象的满意度水平,进而影响政策实施的科学性。因此,需要将单维和多维生活满意度结合起来使用,从而更加精准地测定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水平。

第二,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存在一定的区域性差异。总体上,苏南、苏中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观感受要好于苏北地区,三大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呈阶梯状依次递减态势。江苏三大地区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差异实质上是三大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一个缩影。同时可以将这种差异看作是农民集中居住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的表现。总体上,苏南、苏中代表了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相对成熟的、中高级发展阶段,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基本实现的阶段。苏北地区则代表了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初级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不足。当前苏南、苏中两大区域与苏北地区的主要差异,仍然表现在就业、收入与消费等经济生活方面,而在社区硬件设施与居住环境方面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因此,从提升经济生活质量的角度,如何发挥地区资源优势,加大区域经济发展,“不断创造更多的就业、收入、商品和服务”(苏珊·奥普、杰弗里·奥斯古德,2016),促进农民非农化和城镇化,提升其人力资本素质与自我发展能力,仍然是苏北地区以及其他类似地区未来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的工作重点。

第三,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存在一定的内部结构性差异。当前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在物质与闲暇生活、居住环境、婚姻与家庭、健康等维度存在一定的内在差异。传统上对失地农民生活质量的关注,主要侧重征地补偿、就业与社会保障、收入与消费等结构性要素,而近些年来健康、环境、休闲文化等因素受到重视并被纳入进来,从而使得生活质量的体系不断趋于完善。这表明,随着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因素逐渐被健康、环境等非物质因素所超越,物质因素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尤其是在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南地区。这也基本符合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判断。英格尔哈特(2013)认为,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与工业社会的进步,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从物质主义转向后物质主义——即从优先强调物质温饱和安全转变为更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在后物质主义时代,对环境、健康、教育、休闲的重视成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显著的特点。

第四,综合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满意度得分以及非物质要素的重要性上升,江苏集中居住区居民的生活正在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从恩格尔系数来看,江苏失地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为36.9%,虽然由于土地被征用可能会使他们的恩格尔系数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不过总体上还属于富裕中下的水平。一段时间以来,失地农民由于“种田无地、就业无门、保障无份”而被贴上“弱势群体”的标签。当前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农民集中居住区居民生活水平的变化,使得传统上视失地农民为“弱势群

---

<sup>3</sup>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评估标准,恩格尔系数在30%—40%之间为富裕。

---

体”的固有印象与定位发生改变，要求给失地农民去标签化。这也预示着以苏南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失地农民已从“谋生活”向“品质生活”的方向发展。

本研究的启示在于，生活质量因其“维度—区域—结构”向度而呈现出复杂的样态，而要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特征，形成对于生活质量的整体性、全面性认识，就离不开对生活质量进行“维度—区域—结构”分析。同样，在政策实践中，也要根据生活质量的这一特点采取不同的推进策略。例如，对于苏北地区，重点是提升失地农民的收入、社保等物质层面的福利水平；而对于苏南、苏中地区，重点是提升失地农民的教育、健康、休闲等非物质层面的福利水平，从而做到精准施策、科学施策，最终实现人的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

#### 参考文献：

1. Felce, D. , and J. Perry. Quality of Life: Its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Research in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1995, 16(1): 51-74.
2. Galbraith, J. K.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London: Penguin Books, 1967.
3. Inoguchi, T. , and S. Fujii. *The Quality of Life in Japa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9, 92 (2): 227 \_ 262.
4. Inoguchi, T. *The Quality of Life in Asia: A Comparison of Quality of Life in Asia*. New York: Springer, 2013.
5. Liang Y. , W. Lu, and W. Wu. Are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for Chinese Landless Farmers Really Effective on Health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Rapid Urbanization? A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for Chinese Landless Farmers on Their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 2014, 13(1): 215-243.
6. 陈占锋：《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7. 风笑天：《生活质量研究：近三十年回顾及相关问题探讨》，《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6期。
8. 伽红凯、王树进：《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的福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江苏省农户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1期。
9. 贾燕、李钢等：《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状况变化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9年第2期。
10. 蒋和胜、费翔、唐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集中居住前后农民的福利变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6年第4期。
11. 马贤磊、孙晓中：《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农民集中居住后的福利变化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12. 钱佳、汪德根、牛玉：《城市居民使用市内公共自行车的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地理研究》2014年第2期。
13. [美] 苏珊·奥普、杰弗里·奥斯古德著，天津开发区管委会译：《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寻找共同点》，中国石化出版社2016年版。

- 
14. 田水承、薛明月：《基于因子分析法的矿工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权重确定》，《矿业安全与环保》2013年第5期。
  15. 吴丽、吴次芳：《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失地农民生活质量指数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土地科学》2009年第4期。
  16. 吴云青、张文静、张再生、蔡为民：《中心村集中居住区农民满意度及其敏感性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4期。
  17. 夏永久、朱喜钢：《城市被动式动迁居民社区满意度评价研究——以南京为例》，《地理科学》2013年第8期。
  18. 尹雨晴：《基于因子分析的失地农民幸福感评价研究——以杨凌示范区为例》，《陕西农业科学》2014年第10期。
  19.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张秀琴译：《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20. [美]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著，叶娟丽、韩瑞波译：《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1. 赵丹、黄莉曼：《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及影响因素》，《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22. 周长城著：《生活质量的指标构建及其现状评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